

翻译抉择：列维翻译决定过程论评述

李倩,王静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列维在其《翻译是一个抉择过程》一文中的核心思想是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不断做出决策的过程。它是译者主体能动性的一种体现。翻译好比下棋,在走棋过程中对每一步的多种可能的走法都要做出选择,在做选择时也需要考虑诸多因素。就吉里·列维这一翻译思想,阐述其观点,并评述其翻译思想的启发性和局限性。

关键词:吉里·列维;翻译;译者;抉择过程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4)01-0160-03

吉里·列维(Jiří Levý),捷克斯洛伐克现代翻译研究的先驱,布拉格学派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翻译理论家,翻译理论代表作有《翻译的艺术》《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等。在其著作中,列维运用语言学理论讨论文学翻译标准和技巧等方面的问题。在《翻译是一个抉择过程》(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making Process)一文中列维指出,翻译活动由一系列的步骤(move)组成,每个步骤的完成都与译者的选择相关,所以翻译的过程也就是译者不断进行选择的过程。翻译时,译者的选择贯穿其中,彼此相连,上一个选择将为下一个选择创造特定的语境。所以,翻译活动的特点在于自始至终它都是一个“做出决策的过程”(a decision-making process)^[1]。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翻译好比是下象棋,下一步会受到上一步的影响和制约,结果的好坏取决于译者从最初的理解到最后的润色能否正确圆满地做出判断和抉择^[2]。这也是译者处理原文和译文内容与形式、忠实与美感等一系列矛盾的过程。

1 语义的选择

语言都有一词多义的现象。词语一旦脱离语境,就很难确定它们指示的具体含义。虽然词具有多义性,但在一个特定的语篇中,词义选择的范围是可以确定的。译者应首先确定这个范围,列出可供选择的纵聚合关系语言项,再根据语境确定该词的具体含义。这些纵聚合关系语言项都受同一个指令的限制和约束,列维将这个指令称作“定义指令”(definitional instruction)^[1]。以德语“Mädchen”为例,在英语中有“girl”“lady”“Miss”“maiden”等近义词,这些近义词的定义指令即“a young

woman”。以上近义词在翻译时都是“Mädchen”的备选项,虽不完全对等,它们的风格、延伸意义有所不同,但在语义上都有“young woman”的涵义。同时,列维又把支配译者做出选择的指令称作“选择性指令”(selective instructions)^[1],这些指令在语义、节奏、风格等方面会有所不同。选择性指令与定义指令的关系是集合(set)与子集合(subset)、系统(system)与子系统(subsystem),还有类(class)与元(member)。由定义指令约束的选择子集合被选择性指令排除,选择性指令转而成为这个子集合的定义指令,以此类推,直到译者找出单元纵聚合关系语言项(a one-member paradigm)^[3]。这些指令由语言材料决定,具有客观性,但选择这些指令的是译者,而译者的选择过程与其知识结构、教育程度、审美水平等因素息息相关,所以这样的选择又包含着主观性。

列维指出:“指令与相应的纵聚合关系语言项的模式是由各民族语言的结构模式决定的。如果假定一个语义场,各民族语言的语义场词汇切分的密度会不同。”^[1]例如,英语“morning”在汉语里可切分为两个成分:“早晨”和“上午”。源语的语义切分越宽,也就是从源语的纵聚合关系语言项到目的语的纵聚合关系语言项呈发散的趋势,翻译变体的离差(dispersion of translation variants)就越大,反之亦然^[3]。比如我们在翻译中文“论文”这个词时,会根据语境选择合适的英语表达方式:paper, thesis, dissertation, treatise等等,此时就是出现发散倾向;而在翻译汉语中的“表哥”“表妹”“表姐”“堂弟”“堂哥”“堂妹”等词时,在英语中仅用一个cousin便全包括进去了,此时就是出现聚合倾向。列维认为,从欠发达语言到发达语言的翻译过程中,发散倾向较为明显,比如原始民族诗歌的

英语、法语、德语等译本的离差较大,而从发达语言到欠发达语言的翻译过程中,聚合倾向较为明显,比如《圣经》的原始语言译本的离差就比较小^[3]。如果将某一特定文本译成目的语,又将目的语译为源语,如此反复,那么发散和聚合的倾向在译者的选择过程中会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也就是所谓的“回译”。由于出现了语义偏差,所以“回译”能很好地检验译文文本的准确性。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会受到如何选择词汇这一因素的影响,上述的发散与集中的趋势也会影响译者的选择,而且当所列出的纵聚合关系语言项中有界限不明确的词语时,还需要译者做出恰当的合乎语境的选择。碰到这类问题时,译者可列出几种解决意义或风格的方案。这些方案或许会有很大差别,但译者只需选出一种原文和译文信息一致,即最恰当的方案便可。从此意义上也可以说译者的决定是一种创造性行为。

因此,语义层面的决定过程是要从原文词汇的语义纵聚合关系语言项中选出一种最佳的解释,再从目的语词汇的语义纵聚合关系语言项中选出一种大致与原文相符的意思。译者在不断地进行选择 and 做决定,最终的选择涉及译者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译者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理念以及译者的个性等等因素。

2 极大中的极小策略

翻译理论能指导译者采用最佳的翻译技巧获得最佳的翻译效果,但实际上翻译是注重实效的过程,译者都希望用最小的努力来达到最大或者说最好的翻译效果,也就是列维所说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凭直觉采用了“极大中的极小策略”(minimax strategy)^[1]。

作为译者,都期望能以极小的努力找到所有应表述的意义和风格的语言符号,以此取得最佳的翻译效果。在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中,译者会选择以最小努力达到最大效果的方案。众所周知,电影名的翻译在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往往因社会经济、语言文化和价值取向而异。例如,《Ray》是一部关于美国灵魂乐之父雷·查尔斯(Ray Charles)的人物传记影片,中国内地和香港译为《灵魂歌王》,而台湾译为《雷之心灵传奇》。此外,还有《骚灵乐父》《光芒》等译名。这也就是译者考虑到译本所面对的读者群不同而给出了几个中文译名,以期获得目的语观众的共鸣,使电影译名发挥其最大效果。但此策略还是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评判者和读者因审美观和个人经历的不同对译文的好坏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存在个人偏好。比如电影《The Lord of the Rings》在台湾的译名为《魔戒》,而在内地的译名为《指环王》。这两个译名孰优孰劣无法下定论,有观众偏好前者的翻译,也有观众偏好后者的翻译。所以,此策略操作起来很难判断如何做是最小努力和最大效果。在台湾到处可见的 scooter(小型摩托车)有一个“速可达”的音译词,笔者看来,这能算是译者

以最小的努力获得了最大的翻译效果,因为音译较省力,且这个词无论在读音还是意义上都与 scooter 比较接近,达到了翻译目的和效果。

在此策略的操作过程中,也存在着最小的努力很难取得最好的翻译效果这样的情况。比如,对于那些超出译者自身语言水平或美学标准最低限度的,或者可能会引起读者不快的解决方案,译者往往不会采用;而有些不一定能令读者满意的翻译方案,即使译者经过反复推敲能找到更好的,译者有时还是会急于采用它们,因为这是最小的努力。还比如说,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做出的选择如果使译文既保留了原文风格又保证了语言纯正,那么译者所期望的最好效果就达到了。但有时候的选择可能只保留了原文风格或者是原文语言的纯正,这时,译者就要权衡哪个比较重要,其取舍与目标文化内外因素有关。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何种译法是要考虑到所译文本读者群的量化构成、文本类型、文本体裁以及作者所处的时代等等因素^[4]。关于文本类型,凯瑟琳·赖斯(Katharina Reiss)根据语言维度和语言使用的交际环境把文本类型归为3类: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ype)、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 type)和操作型文本(operative function)^[5]。文本体裁看是否超越了个体(super-individual)的言语或写作行为,如产品说明书、告示等。确定了文本类型后,再确定文本体裁,最后分析语言风格,即关注语言符号、搭配方式等方面的选择^[2]。

“极大中的极小策略”运用在翻译实践中是一个博弈的游戏过程,文本类型不同,读者群不同,其侧重点也就不同。译者在做翻译抉择时,面对的不仅是与原作者、读者、文本类型的博弈,还面临着与批评者、委托人以及其他翻译者的博弈^[4]。译者可采用列维在文中举例时用的相应的数学方法推算出在抉择过程中需优先考虑的因素。

3 列维翻译思想的局限和启示

翻译既是阐释也是创造,它包括一系列复杂的决定过程,其中译者的决定也受各类复杂的、动态的、多层次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列维认为,采用功能的翻译观时不仅要考虑到语义,还要考虑到文本的风格和形式^[6]。他在文章中强调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选择性,给出了可供参考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在微观层面如语义和风格上为译者提供了考虑视角,但列维没有从更广阔的宏观层面考虑,没有具体研究作者的功能角色与他们所处的社会、语言、文化环境等之间的联系。翻译的选择问题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无论是“译什么”,还是“怎么译”,都涉及到译者的选择,但这种选择,不仅仅是译者个人自由的选择,还受到诸如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审美情趣等多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因素的限制^[7]。

列维指出,源语的语义切分越宽,翻译变体的离差就越大。也就是说,语义切分得越细,翻译时可以选择的就

越多。翻译变体离差这个概念的提出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我们可以对语言本身进行分析,对比几个译本,将语义切分为词、词组、句子、段落等几个层面,分析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翻译变体的离差,系统地去研究语言,同时可通过这种方法找出源语与目的语间对等或对应的成分,来看翻译中的对等问题,并且对于文学文本涵义的研究也能提供更多可能的解释,使其解读性更强。虽然列维此观点为探讨翻译中的对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他仅仅指出了翻译中存在的诸多现象,更多的是描述性研究,并没有详细阐述其操作过程和其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翻译的过程是译者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这是列维翻译思想的核心。这一过程除了涉及到微观层面的各种选择外,还包括关于翻译策略等宏观层面的选择,如对归化或是异化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需要考虑译文在读者中所期望达到的功能,在不违背原作意图的情况下采用相应的策略,决定在特定语境中哪些原文语篇信息可以保留,哪些必须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以期获得最佳的翻译效果。如果原文本语篇的文本或其他方面在译文语言中是个缺项,译者就要通过调整译文文本的语篇加以平衡^[8]。译者的选择行为贯穿着整个翻译活动。译文就是译者一连串选择积累的结果。从文本的选择到句子结构、措辞、标点,甚至拼写,译者都有着诸多选择。从理论上看,所有的抉择均处于“完全可以预测”与“完全无法预测”这两极之间,这正好体现出译者肩负的权力与责任。既然抉择处于这两极之间,那么译者做出此决定的原因除了自己的主观意愿之外,还有受到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两套规范的制约,此类角度的思考也开启了后人对于规范的探讨和研究。当代译者在做抉择时已经不仅仅是考虑列维当时提出的那些因素,而是需要考虑其他更多影响翻译结果的因素。

列维提出的“极大中的极小策略”有助于我们研究不同文体手段的效用以及这些文体手段在不同文本类型(如散文、诗歌、戏剧等)中的效用程度有何不同,还有在不同的文本类型中,可比较语言标准和文体风格的相对重要性。列维在当代西方理论的推动下,成功地将定量分析的方法用于翻译,其翻译思想带有布拉格学派的印迹^[9]。在不同时代处理不同文本时,译者需分析译本所面对的读者群的量化构成情况。译者对读者偏爱的实证分析也可以检验译者对于译本的种种假设。但“极大中的极小策略”也存在一定的缺点,比如译者的抉择不仅仅是个博弈的过程,也是一个受知识结构、自身情感、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的过程,并且在此策略的博弈过程中,译者对读者偏爱的实证分析所需的各种信息并不容易得到妥当收集^[4]。而且,译者在翻译时,如何做才算是以最小努力达到最大效果列维也未明确说明,只能靠译者细细揣摩,因此,如果将此策略运用于翻译,操作起来不

便,也有一定难度。

列维在阐述如何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变量问题时意图建构一个翻译的生成模式(generative model),将所有影响翻译决定的可能性因素明确而详尽地排列出来,但他并没有在文中给出具体的模式。所以这种宏观的翻译模式的建立还需要不断研究和探索,因为要罗列所有变量因素供译者参考是很难做到的。但一旦此生成模式确立,翻译工作的研究将会有更广阔的视角。

4 结 语

翻译活动的特点在于它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做出决策的过程”。翻译过程也就是译者不断做出决定与取舍的过程,是译者主体能动性的一种体现。列维将博弈论运用于翻译专题的讨论中,不论是在翻译的哪个阶段,比如原文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确定、翻译时具体的遣词造句,译者都需从诸多的备选项中做出唯一的选择。他提出的“极大中的极小策略”指出译者在所有可能解决的方案中,会选用能以最少努力达到最大效果的方案。他的翻译思想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同时也给以后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可探索的角度。译者在抉择过程中只有全面考虑各种影响因素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其翻译目的。

参考文献:

- [1] Lev ý, Ji ří. Translation as a Decision Process [C]//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2]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3] 方开瑞. 列维论翻译的决定过程[J]. 山东外语教学, 1998(2): 49-51.
- [4] 张冰佳. 浅析“极大极小策略”——从博弈的角度看翻译中的抉择[J]. 丽水学院学报, 2010, 32(6): 59-63.
- [5] Reiss, Katharina. Decision - making in translation: type, kind and individuality of text [C]//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6] Bassnett, 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7] 许 钧. 论翻译之选择[J]. 外国语, 2002(1): 62-69.
- [8] 关 慧. 翻译: 抉择和再造的过程——评介吉里·列维的《翻译是一个抉择的过程》[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2009, 32(4): 125-126.
- [9] Baker, Mona.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0.